

摘要：元青花纹饰中人物题材装饰特别引人注目，故事题材多取自秦汉隋唐的著名历史人物，这些题材在元代的流行并非受元杂剧、版画的影响，主要是与元朝统治者“尚武崇文”的治国思想、“忠臣义士”的祭祀制度和蒙古色目贵族好酒习俗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人物题材；尚武崇文；酒器；祭祀

# 元青花人物题材纹饰考略

◎崔鹏

## 前言

青花瓷器是用钴料绘画烧制的釉下彩瓷器，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元青花是青花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其用传统的笔绘手法，在白地之上用蓝色图饰陪衬起来，颜色鲜艳，图绘明净、素雅，大有传统水墨画的风趣。元青花装饰题材极为丰富，上自天上的云彩，下至地上的山石，以及人物、动物、花草，都能用水墨画法信手拈来，勾捺晕点，运用自如，笔下生辉。这其中人物题材装饰因其绘画精妙，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备受世人的追捧和喜爱。元青花纹饰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历史故事题材极为盛行。如周亚夫屯细柳营、萧何月下追韩信、蒙恬将军、三顾茅庐等。它与元代戏曲小说和版画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sup>[1]</sup>。马希桂先生认为元青花人物题材作品虽然较其他纹饰的为少（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大概只有10余件），但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的出现与元代戏曲小说、与版画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历史故事题材的更为盛行，这是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sup>[2]</sup>。叶喆民先生主张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元青花上的人物题材一般都是秦汉至隋唐以来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故事，或者是元代戏剧故事中的人物。可以说文学艺术与陶瓷工艺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元代青花瓷器上表现得相当突出<sup>[3]</sup>。元青花人物故事的题材虽见于元杂剧，但是数量不多的人物图案装饰的创作是另有深层次的原因，笔者从元朝“尚武崇文”制度和蒙古色目贵族好酒习俗分析，推测元青花人物题材的流行与之有紧密的联系。

## 一、元青花人物题材青睐战争题材

首先，元青花人物装饰题材主要为历史故事题材，有鬼谷子下山、蒙恬将军、周亚夫屯细柳营（图1）、萧何追韩信、尉迟恭单骑救主（图2）、昭君出塞



图1 周亚夫屯细柳营罐



图2 尉迟恭单骑救主罐

(图3)、三顾茅庐(图4)等,涉及的人物大都是秦汉至隋唐以来的著名历史人物,如战国谋略家鬼谷子、秦将蒙恬、汉初名将韩信、汉文帝周亚夫将军、唐开国元勋尉迟敬德将军。同时这些重要人物都是与军事相关的著名人士。换句话说通过国内考古出土的元青花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征,描绘战争相关题材居多,为何元代青花人物装饰这样青睐战争题材?笔者认为与蒙元统治者的蒙古贵族的“尚武”习俗有很大关系。

我们从元代枢府瓷可以找到答案的线索。“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元代枢密院是中央最高的军事机关,在枢密院中有武成王庙,《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五》云:“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牲尊、象尊、笱、豆、俎、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图5)”在景德镇烧造的印有“枢府”款的枢府瓷,是用于祭祀武成王庙供奉的历代名将的祭器。元朝亡后,元枢密院改为北平都指挥使司衙门,明代武成王庙仍设北平都指挥使司内<sup>[4]</sup>。《日下旧闻考》卷一五五引洪武《北平图经志书》云:“武成王庙在保大坊指挥使司之西”。洪武十五年以后,改北平都指挥使司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永乐元年又改为大宁都指挥使司。就在此时,废弃了元枢密院和北平都指挥使司衙署,同时武成王庙的祭祀终结。由此可见元至明初统治者祭祀的都是相同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是“忠臣义士”的英雄。

元青花瓷器上面的人物很多都是元



图3 昭君出塞罐



图4 三顾茅庐罐



图5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统治者祭祀的“忠臣义士”,绘上“忠臣义士”主要是为传达“尚武”习俗的元朝统治者的武德思想,通过战争建立的元朝帝国,对武德思想非常看重。元代枢密院就位于元大都保大坊内,“保大”意为安稳地居于高位,最早见于《左传》,指的是楚庄王的一种军事理念。当时晋楚争霸,两军在邲展开激战,以楚军获胜告终。楚国的大将潘党建议庄王将晋军尸体堆成小丘,树立标志,向世人展示楚国的功绩。庄王批评潘党不懂用武的真正意义,并从“止戈为武”的字义延伸出军事的本来目的是在于“禁暴、戡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是为“武有七德”。在楚庄王看来,照潘党说的做,是一德也没有,身后拿什么给子孙做示范呢?他总结的这些要素在日后被奉为典范。而更早的《诗经》中已有“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的语句,可见古人一直比较注重军事活动中的道德因素。而枢密院武成王庙供奉的历代名将大都是汉将战神,他们正是“武有七德”的最好代言人,蒙元统治者通过他们来传达统治者的武德思想。

另外,从蒙古族供奉的各旗旗神看,也是“尚武”的勇士。蒙古各旗都有全旗供奉的和硕·苏勒德,即全旗主神。如乌珠穆沁贝勒旗的和硕·苏勒德为鄂尔多·苏勒德,其形象为蓝边白锦缎卷轴上绘制的身穿盔甲、背弓箭、手持长矛的骑马勇士像。据说,该神即是成吉思汗的怒相,并有人专人管理,每日供养,每年的旧历三月二十一日举行大型祭祀活动<sup>[5]</sup>。蒙古族萨满教的神偶苏勒德腾格里、戴沁腾格里,均以骑马武士的面貌出现,是蒙古人心目中的战神。甚至蒙古族山神也以骑马勇士形象出现,如巴林右旗境内的赛汗乌拉山的山神,为一骑白马的蒙古勇士,右手持



矛、左手放胸前持宝物，胯带弓箭，英姿飒爽。由此可见蒙古族自己的保护神形象多为英勇的战神，这一传统观念对他们影响深远，那么枢密院的武成王立庙中的祭祀对象应该符合蒙古人的理念，希望通过汉族的战神的帮助来稳固蒙古战神打下的天下。如1956年湖南常德收集“蒙恬将军”玉壶春瓶，造型优美（图6）。瓶腹所绘人物故事画显然与蒙恬将军驻守边防、审讯战俘有关，然而仔细观察画面，故事内容却很特殊，胡人武士、汉人俘虏，这种胡人抓汉人的题材恐怕与元朝蒙古统治密不可分的<sup>[6]</sup>。可见景德镇烧制的历史英雄人物青花瓷器，应该是在像枢密院监督之下完成的，其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 二、“儒家六艺”思想对元青花题材的影响

蒙古贵族不但“尚武”，而且“崇文”。从忽必烈兴学校，许衡定学制，悉取资朱熹，仁宗行科举，在元后期程朱理学，实已牢笼教育科举、思想经术，其在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已开始确立。同时武宗即位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对孔子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蒙古贵族深知儒教对稳固统治的重大意义。仁宗问李术鲁肿，三教何者为贵？对：“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为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上大悦。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及许衡从祀孔子庙庭。至顺元年（1330年）闰七月，加封颜子复圣公、曾子宗圣公、子思述圣公、孟子亚圣公、程颢豫



图6 “蒙恬将军”玉壶春瓶

国公、程颐洛国公。这样全国文庙制度统一了起来，标志着道学的统治地位以及它所宣扬的道统源流的说教正式得到朝廷的敕准<sup>[7]</sup>。正是统治者对程朱学说为代表儒教的推崇，使其比宋代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从而深刻影响了儒士等汉族人士。元青花人物图案中除战争题材的外，如四爱图：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林和靖爱梅鹤等人物装饰（图7），反映出汉族儒士心目中所崇拜的一些偶像，而这些人物恰与元朝程朱学说的代表人物相符，可见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应是蒙古上层推崇的儒教学说在社会的深刻影响，其在艺术领域的表现出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像高安窖藏出土的六件带盖梅瓶，在盖壁与器底分别墨书“礼”、“乐”、“射”、“御”、“书”、“数”，这正是儒家推崇的六艺思想，由此可见元朝倡导的程朱理学影之深。

## 三、蒙古、色目贵族的好酒习俗

其次从器型来看，元青花人物纹饰的器物多是梅瓶、玉壶春瓶、大罐、高足杯等酒器。历史人物与酒器的结合，一方面体现了用酒祭祀英雄人物的大礼，一方面英雄配美酒是蒙古贵族好酒习俗的反映。这些人物故事青花瓷器，相似的特点有：载体都是体型较大的器物，诸如盖罐、梅瓶、玉壶春瓶等。盖罐高度多在25-30厘米之间；梅瓶高度为40厘米左右；玉壶春瓶高30厘米左右。从器物的高度与容积来看，它们都应该是酒器无疑。梅瓶，丰肩、浑圆、收腹、造型挺拔。从磁州窑“清沽美酒”、扒村窑“醉乡酒海”铭来看，梅瓶一般为贮酒器<sup>[8]</sup>。玉壶春瓶，亦为贮酒器，从其名称考察，该器与酒有关，如唐代司空图《诗品·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高足杯也称马上杯，从高安出土元代高足杯，内有诗句：“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可见高足杯是与梅瓶、玉壶春瓶等贮酒器配套使用的饮酒器。

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宫廷和官府的宴会，马奶酒是必备的饮料。祭天和祭祀祖宗，也要用马奶酒，表示不忘本。马奶酒其特点是透明醇香，香气沁人，酒精度不高，绵甜柔软，酸甜可口。这种奶酒不伤人，经常适量饮用，有驱寒、活血、舒筋、补肾、健胃、养脾、强骨等功效<sup>[9]</sup>。马可·波罗说这种酒色类似白葡萄酒，味道极好。这是蒙古族自己酿造的传统名贵饮品，常以招待尊贵客人。青花大罐最可能曾被枢密院用于各种传统祭祀仪式之中，以酒祭神时盛放马奶酒。据说每年都要举行泼洒马奶酒的仪式，蒙



图7 四爱图梅瓶细部详图



图8 元宝山2号壁画墓南壁备酒图

古将军出征之前都要将马奶酒倾倒在地上，以祈求天神腾格里的保佑，元朝皇帝忽必烈在皇宫宴会常把奶酒犒劳有功之臣。成吉思汗建国后，中亚畏兀儿首领亦都护首先归附，生活在以哈刺和州今吐鲁番为中心地区，该地生产葡萄酒。此外冀西北、晋北地区是中亚移民聚居地区，他们习惯于种植葡萄，用以酿酒入贡。蒙元统治者对内实施种族压迫，人分四等，包括蒙古、色目、汉人以及南人。作为元朝社会的上层，蒙古人和色目人的马奶酒、葡萄酒列为宫廷的主要用酒，那么盛酒的梅瓶、玉壶春瓶无疑成为贵族的首选。

#### 四、其它因素

元朝第八帝文宗在位时(1328~1331)，京城的蒙古和色目贵族进一步汉化，竟然对收藏汉地瓷器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元史·别儿怯不花传》记载：“至顺元年(1330)……迁徽政院副使，耀侍御史，特命领宿卫，升荣禄大夫、宣徽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凡宿卫士有从掌领官荐用者，往往所举多其亲昵。至别儿怯不花独推择岁久者举之，众论翕服。宣徽所造酒，横索者众，岁费陶

瓶甚多。别儿怯不花奏制银瓶以贮，而索者遂止。”宣徽院即元大都皇家酒坊，起初用瓷瓶装御酒。别儿怯不花任宣徽使时，京城蒙古和色目贵族争相收藏宫廷御酒瓷瓶，他不得不上奏皇帝，建议改用银瓶装御酒。宣徽院皇家酒坊所用“陶瓶”指浮梁磁局为京城皇家酒坊烧造的至治新器，包括卵白釉或元青花梅瓶和玉壶春瓶；元文宗时(1328~1331)成为京城贵族争相收藏的对象，不断有人向别儿怯不花索要。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当时浮梁磁局烧造酒器的技术可谓炉火纯青，艺术价值甚至超过蒙古统治者喜爱的银酒瓶，从而引发了京城蒙古和色目贵族争相收藏的热潮<sup>[10]</sup>。

我们从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元代窖藏来看，窖藏中的11件瓷器和1件玻璃器当为两组宫廷酒器。第一组为：钴蓝釉戗金彩杯、盘、匜、青花八方玉壶春瓶、勺、青花水龙纹带盖八方梅瓶、青花釉里红镂雕花卉纹盖罐，凡6件酒器；第二组为：卵白釉莲瓣杯、卵白釉龙纹盘、彩色玻璃瓶、青花八方执壶、青海涛龙纹带盖八方梅瓶、青花釉里红镂雕花卉纹盖罐，凡6件酒器。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西高安元代窖藏瓷器的出土，其中有23件元青花瓷、釉里红瓷器，应该为皇家赏赐的两套酒器。一组为青花19件，其中包括6件带盖梅瓶、3件荷叶盖罐、9件高足杯；另一组为釉里红4件，有罐1件、高足杯2件、匜1件。可见国内发现的两处最为重要的元代窖藏，其酒具多为梅瓶、玉壶春瓶、大罐、执壶、高足杯等。另外从内蒙古等地发现的元代壁画墓来看，据不完全统计有十余处，这些墓中都绘有多幅壁画，其中饮茶、饮酒是壁画的主要内容之一，为我们研究蒙元时期的茶酒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如在赤峰元宝山



图9 山西广胜寺壁画



1、2墓（图8）、北峪口墓，在壁画备酒、进酒图中，就绘有酒罐、酒壶、酒杓、托盘、温碗、高足杯、梅瓶、玉壶春瓶。此外从山西永乐宫、广胜寺壁画（图9）中看，此时梅瓶的用途主要用做盛酒器。可见元青花人物纹饰的器物也多是以上几种器形，因其表现的“尚武崇文”思想是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从而在当时就成为祭祀用瓷和贵族争相收藏的艺术品。

最后我们从拥有这些精美瓷器的主人身份来分析，推断元青花人物瓷器的高贵。据目前国内考古出土来看，有明确身份的只有两件，都是高规格墓葬中的随葬品。一是“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图5），5.1×13—44.1厘米。1950年出土于南京江宁县牛首山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墓中。画面在梅瓶的腹部，占据主要位置。上下饰西蕃莲、杂宝、变形莲瓣纹、垂珠纹等。主题鲜明突出。画面中，主要人物萧何头戴展脚幞头，着袍束带，五络须髯。左手控缰，右手挥鞭，策马飞奔。画面的另一侧，韩信头裹软巾，身着长袍，手牵战马在溪边饮水。空白处衬以苍松、梅竹、山石，错落有致。沐英为朱元璋义子，洪武三年（1370年），沐英被授镇国将军，洪武十四年（1381）年平定云南后留滇镇守，卒于1392年，安葬南京，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二是“四爱图”梅瓶（图7），2006年钟祥市明郢靖王墓出土，6.4×13—38.7厘米。瓶腹绘出四个莲瓣纹菱形开光，开光内分别绘有“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鹤”四个画面。画中人物或坐或立，或拱手，或拽杖，或在柳阴下品幽兰飘香，或在梅树下观白鹤起舞。四个不同的画面表现了一个共同的高雅闲逸的主题。明郢靖王为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朱栋，洪武二十四年（公

元1391年）册封为郢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就藩安陆（今湖北钟祥市），卒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享年二十七岁，谥号靖。可见这两件元代“尚武崇文”酒器都出自明初高级贵族墓葬，正是因为墓主人的显赫地位，我们推测这两件梅瓶是元朝后期烧造于景德镇的高级贮酒器，因元末明初的战争成为战利品，朱元璋获得而赐给大将和皇子。

像保定元代窖藏的酒器可能是元仁宗赏赐张珪“上樽酒”时，一道赠与他的。高安窖藏这批酒器是赏赐于伍良臣的高级瓷器<sup>[11]</sup>。清同治《高安县志·封爵》“伍良臣，字云从，元驸马都尉，兴甫之子。坐视富贵，致力经籍，为诗文畅达清润”。可见绘有精美人物图案的元青花酒器极有可能为元代宫廷高级酒器，拥有者正是通过皇帝的赏赐才享有这一时代精美艺术品。蒙元统治者也正是通过这一不断的赏赐，加强君臣的伦理秩序，从而稳定国家的统治。

## 结 语

综上所述，正是元朝统治者“尚武崇文”的治国思想与祭祀制度，加之蒙古、色目贵族的好酒习俗，与浮梁磁局制瓷技术相结合，从而主导了元青花人物装饰图案的精美艺术品的烧造。与此同时元朝盛行杂剧，其曲折的故事情节、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成为流行于市井茶肆，植根于平民百姓之中的百姓文艺。其中不乏有像元青花人物装饰图案的杂剧版本，其人物形象与蒙元上层推崇的英雄人物不谋而合。元时汉族知识分子地位卑下，嘲风弄月的戏剧创作成为士人施展才华的手段。同时蒙古统治者对戏曲歌舞本能的爱好又默许文人与戏剧的结合<sup>[12]</sup>。元瓷中的历史故事的装饰内容，也间接反映了社会各层对这一娱乐形式的爱好。

## 注 释：

- [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51页。
- [2] 马希桂：《中国青花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 [3] 叶喆民：《隋唐宋元陶瓷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245页。
- [4] 徐莘芳：《元大都枢密院址考》，《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 [5] 宋兆麟：《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271页。
- [6] 杜金鹏、焦天龙、杨哲峰：《中国古代酒具》，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
- [7] 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0页。
- [8] 江建新：《景德镇宋、元、明瓷酒具考》，《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 [9]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 [10] 林梅村：《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9-31页。
- [11] 刘金成：《高安元代窖藏瓷器》，朝华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 [12] 朱裕平：《元代青花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